「天地閉，賢人隱」的十年

余英時

中國史上已經歷過多次「天地閉，賢人隱」的遭遇，但都阻止不住下一個「天地變化，草木蕃」時期的必然降臨。今天也不可能是例外。以今天的處境而言，知識人正好在此寂天寞地中動心忍性，各就所能，深耕密植，以響應「為了中國的文化建設」的號召。在經過「天地閉」的一段嚴寒之後，「天地變化」的春暖花開還會很遠嗎？

《二十一世紀》創刊一轉眼竟已十年，這一高水準的學術性、思想性刊物能維持到十年之久，而且歷久彌新，我們不能不深深感謝主持編務的許多朋友所付出的無限心力。我雖然掛着本刊編委的虛銜，事實上毫無貢獻，只能算是一個忠實的讀者。所以我可以毫不避嫌地讚揚本刊的成就。在此十周年刊慶之際，我本來應該多說些善頌善禱的話。但轉念一想，也許還是回顧一下十年以來的史迹，更能凸顯出本刊存在的意義。限於時間，我的話不但十分簡短，而且即興而發，想到那裏便寫到那裏，這是必須請編者和讀者原諒的。

十年前本刊創始，其歷史背景人人皆知，那是在一場驚心動魄的大悲劇剛剛落幕之際。80年代中，大陸上知識人恰好碰到了一個極其短暫的自由假期，「五四」的精神忽然獲得了一點點復活的空隙。儘管當時許多知識人由於長期與外面的世界隔絕，對於中西文化和思想問題的認識都極為有限，然而他們的頭腦則是十分活躍的，氣象更是非常開闊的。像「五四」一代的知識人一樣，他們仍然在潛意識中繼承了傳統士人「以天下為己任」的自我形象，儘管在他們之中頗有不少人對

中國文化多抱着「反傳統」的態度。所以一直到1989年為止，至少就文化知識界而言，大陸上似乎有一種「天地變化，草木蕃」的表象。知識人便在這一假象之下，越來越增加了「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自信，他們竟把意外獲得的短暫假期誤認作可以長期享有的生活常態，於是大悲劇終於不可避免地發生了。《二十一世紀》的出世可以說是「天地變化，草木蕃」這一表象所激起的一點餘波。更諷刺的是當時在「神」已喪盡的「神州」邊緣還存在着一個末日即將到來的殖民地和租界，竟能提供一隙自由空間；這是《二十一世紀》終能呱呱墜地的客觀條件。

那麼本刊創建十年來又是怎樣一種景象呢？再一次借用《易經》的語言，這已是「天地閉，賢人隱」的世界。誠然，如果你是一個純「經濟人」而恰好又擁有種種「關係」，你一定會覺得今天的「神州」是從古未有的「盛世」。這裏出現了一個古今中外從未見過的「社會主義市場制度」，只要你有幸居於「無產階級先鋒隊」前列，你便可以在這個「市場」上大展身手，呼風喚雨。這樣一來，你搖身一變，可以在一夕之間成為「神州大資產階級先鋒隊」的成員，在國際上取得大企業家、銀行家的低頭膜拜，為「神州」洗盡一百多年的「國恥」。尤其令人艷羨不置的，你雖然躋身「神州大資產階級先鋒隊」的行列，卻完全不必像帝國主義大資產階級那樣，隨時要提防着公眾和他們作對。因為你是受國家保護的。至於那些大量下了崗的工人，或在生存線邊緣掙扎的無數農民，你也用不着擔心。因為反正他們會很耐心地等待，等着你「先富起來」。萬一其中有人甘犯「右傾冒險主義」的錯誤，向美洲或歐洲「燥進」，悶死在貨櫃之中，那也是咎由自取。你的「良心」仍是乾乾淨淨的。總之，對於「經濟人」來說，「神州」確已「開放」到極邊盡限了，也「改革」到盡善盡美了。上面所引《易經》上的話，對他們是完全不適用的。

「天地閉，賢人隱」這句話只有對於那些不識時務的「知識人」才有意義。我在「知識人」之上特加「不識時務」四字的限制詞，正是因為「知識人」千門萬類，未可一概而論。對於「識時務的知識人」，我無話可說。所以下面的話都是以「不識時務」一型的「知識人」為對象。但為了行文簡潔，限制詞一概刪落，特此聲明在先。

就最近一兩年的發展趨勢說，「神州」知識人處境之艱苦是不可想像的。他們現在大概在私人談話中有發發牢騷的自由了。這是因為「先鋒隊」面對着越來越複雜的異化世界，已實在沒有足夠人力去嚴格執行「偶語棄市」的政策了。更何況這些執法者還必須分出大量的時間使自己也能分享「市場經濟」的繁榮。異化世界同時也必然是一個花花世界，「軟紅十丈」的誘惑力實在太大了。但是知識人只要不識時務到用文字表達對於國事的評論，他的厄運便立即降臨了。厄運的方式千奇百怪，讀者大致都耳熟能詳，用不着多說。最近少數原居於「先鋒隊」的前列人員，只因為脫了隊，回到了知識人的最初立場，寫了一些「不識時務」的文字，雖僅能在網絡上出現，也引起了領頭人的赫然震怒。不但如此，「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連帶着使好幾位與此案無關的知識人也遭到了解職的處分。出於一種草木皆兵的極端疑懼心理，知識人已被視為最可怕的「神州」的

亂源了。「墨儒名法道陰陽，閉口休談作啞羊。」陳寅恪1953年的詩句不圖復見於新千禧年伊始之際。這不是「天地閉，賢人隱」，是甚麼呢？

但對於今天的知識人而言，這真是千古奇冤。十年的歷史變化早已「換了人間」，知識人哪裏有80年代末的社會號召力？我已指出，1949年以來「神州」知識人的邊緣化一直在加速度的下墮過程中，但今天才真正抵達了平地。「先鋒隊」現在十分懂得科技對於掌權的重要性，所以科技人員可以恃「工具理性」取得特殊的地位。知識人則以「批判理性」為其最主要的特徵，無論他的專業是自然科學或人文社會科學，僅僅代表「工具理性」的科技人員與知識人是薰蕕不同器的，這已是一般的常識，毋須再述。十年來的威脅利誘，早已腐蝕了不少知識人的「批判理性」，使他們在「識時務」之餘，或以「三代」，或持「三後」，為「先鋒隊」搖旗吶喊。剩下來的知識人在重重打擊之下則七零八落，既沒有發言的空間，更失去了熱心的聽眾。「先鋒隊」對他們戒備森嚴實在難以索解。台灣的知識人在今年大選的最後關頭，因有人振臂一呼，而立即發揮旋乾轉坤的絕大威力，這在今日之「神州」已不可想像，只有十一年前或彷彿近之。

更重要的是求變的基本動力已從知識人下移至社會基層，常有一種盲動的意味。清初，呂留良、曾靜所謂「世路上英雄」或「光棍」的歷史表演難保不會重現。在這種可能出現的新形勢裏，知識人不但靠邊站，恐怕也不甚相干了。

《二十一世紀》是在「天地變化，草木蕃」的流風餘韻中出現於世的。但在「天地閉，賢人隱」的局面中，它究將何去何從，這恐怕是一個找不到答案的問題。當初香港為本刊所提供的自由空間是否還能繼續下去，又能繼續多久，現在看來，更不能不是一個使人惕然以驚的問題。最近一段時期，香港竟以「學術自由」的問題播聲國際，《紐約時報》也以顯著的篇幅和位置詳加報導。殖民地時代所未曾出現過的問題今天竟已成為從大學校園到社會都紛紛議論的問題，這未免使人興「一葉知秋」之感，難道香港的知識人也將逐漸向「天地閉」的境界走近了麼？這是我所不敢相信，也不願相信的。

在慶祝本刊十周年的文字中，我竟說了許多非常低調的話，這也是證明了我的「不識時務」。但是我只是一個短期的悲觀主義者。從長遠處看，我始終不相信任何橫暴勢力可以長久壓制住「批判理性」——因為這是人類文化不斷上升的主要根據與動力。中國史上已經歷過多次「天地閉，賢人隱」的遭遇，但都阻止不住下一個「天地變化，草木蕃」時期的必然降臨。今天也不可能是例外。現代的知識人雖已遠不能與傳統的「士」相提並論，然而在促使「天地變化」的大事因緣上仍有其無可旁貸的責任。以今天的處境而言，知識人正好在此寂天寞地中動心忍性，各就所能，深耕密植，以響應《二十一世紀》「為了中國的文化建設」的號召。《二十一世紀》和中國知識人的命運是緊密連繫在一起的。在經過「天地閉」的一段嚴寒之後，「天地變化」的春暖花開還會很遠嗎？

余英時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講座教授